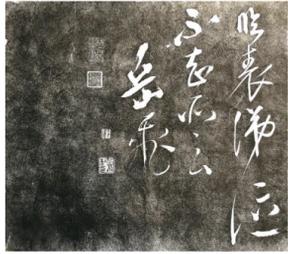


电影《满江红》火爆,引出一——

岳飞书《出师表》碣石和陕西抗金名将

人物



三原县城隍庙内,岳飞所书诸葛亮《前出师表》《后出师表》碣石。

兔年春节,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《满江红》持续受到观众好评,让一代名将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被世人一遍遍重忆。有网友在看完电影后,专门跑去参观陕西三原县城隍庙保存的岳飞手书诸葛亮前后《出师表》碣石;在岳飞蒙难之际,一位既是岳飞的好友也是抗金名将的陕西人,也被网友翻找出来,他就是陕西绥德汉子韩世忠。

三原城隍庙岳飞书《出师表》
“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,今天下三分,益州疲弊……”在三原城隍庙内东西廊碑嵌有摹刻岳飞书法的碣石前,观众们拍照、打卡、诵读,体会和感受岳飞当时的心情。

在三原县城关镇东大街中段的城隍庙内,保存着40方抗金名将岳飞所书诸葛亮《前出师表》《后出师表》碣石,岳飞的书法章法严谨,气韵生动,字里行间透露着雄浑与厚重,饱含英雄的气概;而在该庙前院木牌楼上,还悬挂有“岳飞赶考”主题的木板雕刻。

据了解,岳飞挥毫所书诸葛亮前后《出师表》,墨迹曾在民间几经辗转,被项城人袁保恒(系袁世凯叔父)在陕西巡查军务时发现并收藏,后交著名工匠樊登云精心镌刻流传至今。此石碑撰文、书法、篆刻者皆属当代名人,故被誉为“三绝”碑,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,颇受国内外各界人士喜爱。

诸葛亮庙岳飞书《出师表》
陕西还有一处庙内保存了岳飞书《出师表》

碣石。在岐山县城南20公里的五丈原镇的诸葛亮庙内献殿内的山墙上,绘有“三国演义”故事壁画,下方嵌岳飞书诸葛亮前后《出师表》碣石40方。碣前有明太祖洪武年御题“纯正不曲,书如其人”八个字。

该殿始建于元至正初年,明清至民国数次重修,该处殿嵌同岳飞书前后《出师表》碣40方,共同作为五丈原诸葛亮庙的组成部分,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“五丈原诸葛亮庙”为第三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全国现存岳飞所书诸葛亮前后《出师表》石碑者,有陕西勉县的武侯祠、岐山县的五丈原、三原县的城隍庙和河南汤阴岳飞庙、河南南阳武侯祠共5处。

质问秦桧“莫须有”的韩世忠
“胭脂的婆姨,绥德的汉。”这句广为传唱的民谣源自三国时期貂蝉和吕布,这两个地方都位于陕西榆林。岳飞的好友韩世忠正是一位来自绥德的汉子,跟岳飞既是“战友”又同为抗金名将。在岳飞蒙冤入狱后,韩世忠仗义执言,为岳飞鸣冤,跑去质问秦桧“莫须有”三字,何以服天下?”

历史的云烟已散去,韩世忠与岳飞、张俊、刘光世合称“中兴四将”,因抵御西夏及抗金有功,病卒后追封韩王,谥号忠武,配飨宋高宗庙廷。作为绥德人的韩世忠成为陕西人的骄傲,今天在位于绥德县名州镇七里铺村一步岩南侧的韩韩王庙,每年农历七月初八为当地民众集

会祭奠韩王日,举办多项缅怀活动。

“韩王”是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封号。韩世忠,字良臣,生于今绥德县崔家湾镇纸房沟村。他出身贫寒,幼年随母行街乞讨,但自幼好勇善斗,乐于扶弱助贫,怀有一身打抱不平的豪气。长大后在人间横行霸道,欺压百姓,他戎马一生,保家卫国,被宋孝宗追封为“韩王”,赐谥号“忠武”。

韩王庙建于清代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,正面是一孔高大、宽敞的石拱窑洞,正中是韩世忠的坐像,庙前立石碑4通记载着韩世忠抗金卫国的英雄事迹。目前,韩韩王庙现存清代题刻3处、碑碣9通(方),2008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。□刘丹



韩王故里。

一曲曲如痴如醉的陕北民歌——

承载着陕北人悲苦酸甜的人生故事

民俗

非遗文化像一架桥梁,无言地连接着榆林的过去与未来,凸显着这座古城里蕴藏的岁月故事,流淌的历史烟云,记载的风雨沧桑。一曲响遏行云陕北民歌,飘洒着黄土土地上泥土的芳香;一声荡气回肠的信天游,流淌着黄河儿女最真诚朴实的情感。

陕北民歌是世世代代的陕北人用“拦羊嗓子回牛声”吟唱喊出的山野之声、里巷之曲。当每一首天籁之音响彻在陕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,一幅幅雄壮秀美的画面扑面而来,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面孔演绎着同一种深情。2008年,陕北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黄土土地上的深情呐喊

陕北,是民歌的海洋,民歌的世界。陕北民歌借景抒情,自由奔放,热情浪漫,曲调优美,朗朗上口。它是陕北人民真真切切的情感表达,唱出了陕北人不屈的意志和世代与自然和生命抗争的自我倾诉。

一首《东方红》从纵横壮阔的黄土高原,到浩瀚无际的寰宇银河,唱出了佳佳受苦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领袖毛泽东、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感激之情。一首《赶牲灵》唱出了黄土土地上的劳动人民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、追求幸福生活的情景。一首《榆林花》将榆林

的秀美山水和繁华的人文风情一一描绘,让人心生神往。一首《神仙挡不住人想人》唱出了黄土土地上的深情呐喊,带我们走进黄土高原上平凡的世界……

在纵横逶迤、古老深厚的黄土高原上,陕北民歌以其婉转的旋律,顿挫的节奏,简单的歌词凝聚着黄土土地上陕北人民的智慧结晶,记录着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。质朴的歌词和唯美的曲调是陕北人对历史的叩问,是对现实的感叹,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,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呐喊,饱含着陕北人的精神寄托,代表着独特的精神标识。

用声音传递文化

陕北,地处黄土高原,山连着山,沟接着沟。滔滔黄河孕育了灿烂的文化,积淀了丰厚的民俗民情,见证了陕北人朴素纯真的生活。陕北民歌是一部用老黄牛雕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,是黄坡黄土之间的一朵奇葩,其品类丰富,主要包括信天游、山曲、爬山调、船工号子、大秧歌调、旱船曲、酒曲、二人台、榆林小曲、清涧道情、传统小调及众多民间歌曲。

信天游属于民歌中的山歌体,是山野之歌,曲调悠长高亢,粗犷奔放,韵律和美,它构筑了陕北民歌的主体。劳动者子旋律高亢,朗朗上口,节奏感强,是劳动者伴随劳动节奏

而唱的民歌。小调不受任何环境条件的制约,无论是在田间放牧,还是在家做针线、推碾子等,都可随心而入的心情即兴唱上几句,表达最真实的情感。

歌从陕北来,高亢嘹亮的陕北民歌从黄土高原唱响大江南北,唱者情感丰沛,听者心绪激昂,那种场景,成为陕北文化里一个特定的符号,是外地人心中陕北风情的特写。它来源于世世代代的生活之中,也传唱于生活之中,是榆林人茶余饭后的生活日常,是流淌于榆林人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,更是黄土高原的文化符号。

陕北文化活化石

陕北民歌是传承载体文化的载体,它以音乐为符号,穿越古今,储于民间,纵向传承,横向传唱,经由世代子孙口耳相传,历久弥新。陕北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,位于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交界之地,也是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频繁往来的交汇地,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陕北文化。

早期的陕北民歌一直以口头形式来传承,它随着陕北人民的日常生活和陕北的历史以及民俗活动而诞生,并留传至今。20世纪30年代以前,陕北人民依照自己的生活与习俗,触物生情,即兴编唱,靠口头传唱而流行,靠集体创作而繁荣。20世纪三四十年代,

“闹红”、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为陕北民歌增加了新的内容,形成陕北革命历史民歌。

新时代下,掀起的“原生态音乐”热潮,迎来了陕北民歌发展的又一个春天。“天上有个神种,地上有个人。神神照着人人,人人想着亲亲。”当《黄河神曲》骤然响起,浑厚浓郁的天籁,简单质朴的生活元素,共同谱写了一首黄土土地上的交响曲。米剧《米脂婆姨绥德汉》以陕北民歌为链条,剧中歌曲或高亢悠远,或柔曼如水、或纯真细腻,一首首原生态民歌大俗大雅、竞相生辉、荡气回肠。陕北民歌是米剧的灵魂和成功的关键,是延伸传统的灵性演绎。

陕北民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人民的生活、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。现在所流行的陕北民歌,大部分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,既有反映社会变革的内容,也有“长工歌”的内容。纵观陕北民歌的发展变迁史,就是一部陕北人民世世代代的精神史、心灵史和命运史。

陕北民歌以音乐为符号,承载着陕北人悲苦酸甜的人生故事,是陕北人对美好生活的呼唤,是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。世世代代的陕北人将生活谱写成一行行,一曲曲如痴如醉的陕北民歌,这声音源远流长,穿越时空,生生不息。□贾怡

奉正塬传说

胜迹

奉正塬,亦称降驾塬、白蟒塬,在高陵妇孺皆知。高陵之名也与之息息相关。《高陵县地名志》载:“高陵之名始见于周代,因境内有奉正塬,横亘于南,塬体高隆,壮若土山(土山曰陵),故名高陵。”

奉正塬主体位于西安北郊泾渭河北岸的高陵区,西起泾阳县永乐镇,横亘高陵姬家、崇崇、耿镇、张卜四个街办,东迄临潼区任留乡,全长约22.5公里。奉正塬顶宽约1.5公里,平均海拔约390米,土层深厚,土质肥沃,古称“黄壤陆海”。

传说古时有一位秀才叫白奉正,进京赶考路过泾河。因救了泾河小龙王,成了泾河龙王的乘龙快婿。不久,白秀才和泾河小龙王生下9个儿子。但9子在人间横行霸道,欺压百姓,肆意发水淹没八百里秦川。玉帝知道后,派员将9条孽龙押赴终南山处死,也将白秀才就地斩首,头放在西安北郊龙首塬,身子放在泾、渭河北岸,后化作一道土塬,以阻挡泾渭二水北侵。因白秀才叫奉正,故称奉正塬。

千百年来,奉正塬上的古文化遗存数不胜数。据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证明,这里不仅是中华民族世代繁衍生息的聚集地,而且很可能是“中国”的雏形和中华文明起源地。如高陵马南村仰韶文化遗址、毗沙村仰韶文化遗址、米家崖龙山文化遗址……特别是高陵杨官寨遗址分别在2008年和2017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。该遗址属庙底沟文化,年代比半坡更早且聚落规模更大,建有大型环壕、中央池苑、大型普通居民公共墓地,这些都显示出杨官寨遗址为当时社会大都会,将西安建城史、建都史提前至5500多年。

奉正塬紧贴泾、渭河北岸,塬高水急,是古长安北一道天然屏障,更是戍守长安的军事要地。周赧王曾于此筑寨屯兵,今有赧王寨遗址。唐代宗永泰元年(765年),李忠臣屯兵奉正塬东渭桥,以防吐固怀恩等进犯长安。德宗建中四年(783年),刘德信入援京师,大战朱泚于见子陵,进屯东渭桥就食漕粮。德宗兴元元年(784年),李晟平朱泚之乱,亦屯兵于此。后封为西平郡王,葬于奉正塬上,墓前立有“三绝碑”。僖宗中和元年(881年),黄巢称大齐皇帝,部将朱温屯兵于此。元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李思齐在奉正塬筑台筑城戍守。明洪武二年,徐达克同州,趋长安,兵出鹿台,元守将张思道,望风披靡弃城而逃。

1933年5月31日拂晓,刘志丹、王世泰率红二团攀上塬顶,用绳索从崖上下到崖下,将渭桥渡口的民团匪徒一举歼灭,夺下渡口,渡过渭河。1949年5月,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军安图以奉正塬、咸阳塬、泾渭河为马蹄形防线固守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,攀塬涉水,突破防线,解放了西安。□高涛

西安清真小吃的种类与来源

秦味

西安的清真小吃品种,其来源分三种:一是当年直接从阿拉伯引进,如水盆羊肉、羊肉泡馍、油香、哈鲁丸(哈鲁丸是阿拉伯语,糖果、甜品的意思,如芙蓉切这样的糕点)等;二是结合中国灶具与原料,自发创制,如凉糕、肉油饭、粉蒸肉、圪塔油菜、饸饹馍等;三是学习汉族小吃技艺,改造成独具特色民族小吃,如酸汤饺子、糍糕、甑糕、江米糕、油糕等。

那么,历史最为悠久的小吃,除了大家已知的水盆羊肉、羊肉泡馍、饸饹馍等,唐代还有哪些清真饮食的印迹呢?

甑糕是在唐代就出现的一种小吃,且为关中地区特产,后流传于周边各地。顾名思义,甑糕就是以红枣和糯米为原料,用“甑”蒸制成的糕。“甑”是置于甬或釜上蒸制食物的炊器。三国时周《古史考》中记载:“黄帝始作釜鼎,火食之道始成。”可见,“甑”在原始社会后期已经产生。

到了新石器时代,有了陶甑。到了商周时代,除了陶甑以外,又出现了铜甑。战国以后,铁器产生后,“甑”又由青铜改变为铁甑。从此,铁甑就世代沿袭,流传至今。这种铁甑,形似圆筒,与陶甑、铜甑在式样上不完全相同,但铁甑没有底,在底部有一个铁甑篦,使用起来就方便了。现在在西安及关中地区的甑糕就是用这种古老的铁甑蒸制的。

尽管“甑”的历史很悠久,但是将糯米与红枣结合起来蒸成的糕食品,则出现在唐代。韦巨源宴集中宗皇帝的“烧尾宴”中的“水晶龙凤糕”和现在的甑糕应该是一脉相承的。

需要说明的是,西安回坊有甑糕和镜糕两种,如果按国标发音,很容易区分。但是,多年来西安人一直将甑糕读作(jing)糕,把镜糕读作儿化音“镜儿糕”。但是外地人搞不明白,常常把甑糕与镜糕搞混。网络上的互动百科介绍甑糕时,配的是镜糕的照片。百度百科介绍甑糕时,用的是蜂蜜凉粽子的照片,令人啼笑皆非,颇有误人嫌疑。

另外,还有凉糕、糍糕、沙糕等,可能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小吃,只是没有有力证据,我们只能依据其制作工艺、厨具与原料等,来推测其出现的大致时间。

西安清真小吃的特色之一就是品种丰富,制作工艺别致,仅以糕类小吃为例,列出名字,可能就会让人眼花缭乱:甑糕、镜糕、绿豆糕、芙蓉糕、凉糕、糍糕、油糕、沙糕、小豆糕等等。我想,就是西安人,也可能很难将这些糕名与实物一一对应。□白剑波



甑糕。

古人餐桌上的“外来妹”

钩沉

张骞“凿空”西域,凿通了一条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(1833—1905年)称之为连接东方与西方的大道——丝绸之路,这是一条横贯东西方的国际通道。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《丝绸之路史研究》一书中说:“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,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,依靠商队传播至东西各地,同时又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。促进了各地的文明。丝绸之路所以受到众多人们的注意,主要是因为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动脉。”

丝绸之路的开辟,使地中海岸到中国海岸这一古典地带,各民族之间从物质的生产、生活,到精神的礼尚习俗,不断相互交换,相互补充,共同发展,千百年之盛衰兴替,蔚成古典世界文化历史之灿烂辉煌。

丝绸之路的开辟,中国的丝绸运往中亚、西亚乃至欧洲,使丝绸成为最大宗出口的货物,除丝绸外还有漆器、冶铁和制作铁兵器等技术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载:大宛人从“汉使亡卒”学会了铸铁技术,安息人也从汉朝输入铁产品。那时也有许多中国的物种传入西域。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一卷中就曾指出:“……当然也有从中国传出去的植物和树木,品种至少是等量的。柑橘最初大概生长在中国边境地区,包括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西藏边境地区,可是很久以前就被传到国外。……中国西部山区花卉品种之多,实在令人惊奇,那时已有了现在西方人花园中栽培的那些玫瑰、芍药、杜鹃花、山茶花、菊花等等了。”

张骞出使西域,使中西物流畅通,于是中亚传入的食品种类繁多,如瓜果蔬菜类以葡萄、苜蓿、石榴尤为著名,葡萄、苜蓿是大宛的特产,葡萄译自伊兰语,汉代文献称“蒲陶”或“蒲桃”,汉使带回栽种长安。苜蓿称光风草



中的胡椒插图。明代佚名绘《补遗雷公炮制便览》

或连枝草,李广利从大宛得葡萄、苜蓿后遍植于汉宫别馆,李广利带回的天马以苜蓿为主。石榴是张骞从大宛获得,归国后移植于中原。那时从中亚传入的农作物更多,如胡桃、胡桃、胡豆、胡瓜、胡葱、胡蒜等,西晋名士张华的《博物志》最为典型,他把胡桃、大蒜、胡葱托附在张骞名下。胡麻今称芝麻,陶弘景说原产于大宛,胡桃即今天关中农村栽种的核桃,原产于波斯北部,阿富汗东部有野生的,汉武帝时,上林苑里种有胡桃。至于胡豆(蚕豆、豌豆),也是从波斯和中亚传入。胡瓜,原产埃及或西亚,乌孙、大月氏、匈奴也有种植。四世纪初,石勒时避讳改名黄瓜。胡蒜即今天大蒜,原产于大宛。胡葱即今香葱。

这些引进的食材,在汉唐时代十分珍贵,多为达官显贵食用。如胡椒到了唐代价格昂贵,仍为达官贵人的专用食材,且作为

财富囤积。唐代宗时宰相元载结党营私,把持朝政,贿赂公行,排斥良臣,生活奢侈。大历十二年(777年),贪赃受贿事发,被代宗赐死抄家,查出胡椒900石,可见唐代贵族阶层以胡椒做财富的标志,也说明胡椒尚未普及到庶民百姓之家。

胡椒如此,黄瓜亦不例外,黄瓜是张骞从西域引进,初称“胡瓜”,东晋时更名黄瓜。汉晋时代,黄瓜是稀有,能食黄瓜的人寥寥可数,直到明清时代仍是初春餐桌上的珍品,价格极惊人。当时有钱人家才吃得起。李重瑞《北平风俗类征·饮食》记载:光绪年间(1875—1908年)京师小黄瓜,“价昂如米,凡宴贵客者用以示珍也”。《京都竹枝词》云:“黄瓜初见比人参,小小如簪值数金。微物不能增寿命,万钱一食是何心?”

黄瓜,“价昂如米”“比人参”“万钱一食”,可见价格昂贵了。呼延云在《黄瓜曾经“万钱一食”》一文介绍,晚清曾任翰林院编修的著名学者潘炳年,在北京广和居宴客,客人是新结识的朋友。友人点了一盘黄瓜,吃完之后觉得味道不错,又点了一盘。“更点而再三”,这位友人光耀品赏美食佳肴,殊不知潘炳年早已是满脸不平条约了。待散席结账后,拂袖而去,与其绝交。原来“燕京冬春黄瓜,价昂昂,(一味)值银五六两,谓疑友人知之,而故以相窘也!”这个吃黄瓜事一时间在京城传为笑谈。今日,随着农业科技的普及和大棚温室的推广,再不会因食一盘黄瓜与友人反目了。“万钱一食”也定格成永恒的历史记忆。

在张骞引进的食材中,胡椒、黄瓜以价格昂贵市肆扬名。而蔓菁易于种植,国家大力推广,普及早,具有群众性的特征。近些年,市民在节假日乐于乡村游,赏田园风光,

吃农家饭,成为新风尚。人们吃农家饭时,也常常吃野菜蔓菁。蔓菁学名芜菁,别名九英松,新疆维族叫“恰玛古”,是羊肉的伴侣。叶、根可鲜食,亦可盐腌,制干后亦可食用或作饲料。许多人以为蔓菁是土得掉渣的关中老土,探幽索源,如果需要摆明蔓菁的正宗血统,殊不知它是二千年前国人餐桌上的“外来妹”,原产于中东两河流域(一说为欧洲)是张骞通西域后引进的,据《后汉书·桓帝纪》载,永兴二年(154年)已广泛种植,成为救灾充饥之菜,进入寻常百姓的餐桌。唐宋时代,文人的作品中常有描述,倡导古文运动之首的韩愈在《感春诗》中有“黄黄芜菁花”句。蔓菁从叶到根都能吃,是过去关中人春季度荒时天赐美食。蔓菁与苏轼的关系令人怦然心动。

苏轼一生宦海沉浮,处处观察各地烹调方法,他不仅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,而且是一位知味嗜食的美食家,著《酒经》《黄州寒食诗帖》等饮食名著,还是一位精烹善调、自己动手制了东坡肉、东坡羹、东坡饼、东坡豆腐、芽菜、猪肉脍等名饌佳肴的烹饪大师。他在《狄御州煮蔓菁芦菔羹》诗中写道:“我昔在田间,寒厄有珍烹。常支折脚鼎,自煮花蔓菁。中年失此味,想像如隔生。谁知南岳老,解作东坡羹。中有芦菔根,尚含晚露清。勿谓贵公子,从渠嗜膾腥。”

苏轼在诗中称以蔓菁与芦菔作的羹,比那些月腥、腥羊、鱼烹制的汤还香得多。掸去岁月的烟尘,可知国人食蔓菁之俗二千多年,真可谓历史悠久。

丝绸之路的开辟,中西文化的交流频繁,贸易畅通,汉代社会如日中天。历史证明,任何社会的发展,不能夜郎自大,自我吹嘘。只有打破闭关自守,建立开放包容体系,才能广开渠道,加速社会发展的步伐。□韩养民